

中国市政学研究范式:传承与演变

王佃利,王玉龙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100)

摘 要:市政研究领域如今正成为一片理论的“丛林”,市政学、市政管理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政治学等不同的研究理念各自竞存。面对纷繁的概念,怎样发现其内在的关联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回顾学科范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线索就变得十分重要。市政学自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入中国后,经历了 1952 年课程改革时的撤除和改革开放后的重新恢复。其间,市政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三次演变,传统市政学从政治学视角研究市政体制的架构,现代市政学从行政管理学视角研究城市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管理,而城市政治学则“回归”政治视角研究城市权力、城市治理以及城市公民相互影响的过程。

关键词:城市政治学;传统市政学;现代市政学;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5-0047-06

改革开放以来,与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是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涌现的城市化现象及城市治理中的公共问题不仅需要城市管理者思考解决之策,更需要学术研究者探索其产生的原因和运行规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城市快速发展及有效治理的需求带动和促进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在学术界的扩展和深化,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探讨中国城市应当如何发展。由于现代城市问题纷繁复杂,有关城市研究的书籍卷帙浩繁,为此有必要从学科发展演变的视角出发,对纷繁驳杂的城市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本文以市政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回顾总结市政学研究范式在中国的传承和演变,使读者能够对中国市政学的发展脉络获得清晰认识。

按照历史的维度,中国市政学的学科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发端于“民国”时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海外的学者将市政学引入中国,在中国建立市政学学科,探索有助于城市自治的市政体制;重建于改革开放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 1952 年课程改革中遭到撤除的市政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得到恢复;拓展于 21 世纪,随着

市政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一部分学者另辟蹊径,回归政治学视角研究城市治理问题。

一、传统市政学研究范式“民国”时期市政研究的发端

城市,在 20 世纪初对走向近代化的中国是个美好且令人激动的想象。清朝政府于 1909 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开启了中国近代城市建设的进程,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大量增加则开启了中国市政建设和市政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在许多城市中,市政建设是最具现代化的举动,如 1920 年留学美国的孙科在广州推行市政改革,制定《广州市暂行条例》;1929 年济南市建立起现代市政制度,大力推进道路交通、供水供热、医疗卫生等城市公共事业建设。此外,福州、南京、杭州、昆明、北京、天津、汉口等地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也陆续大力筹办市政。

在学术界,市政学研究以董修甲、陆丹林、张锐、张慰慈等留学生代表为媒介从欧美舶入中国,并一时成为研究热潮。据学者赵可统计,从 1920 年至 1937 年,国内出版的市政学译著书籍共有 121 部,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市政学研究也未中断。国内研究主要涵盖城市政府及城市行政、城市规划 and 市政工程等方面,对世界城市发展最新动向和理论均有介绍^[1],如陆丹林所编著的《市

收稿日期:2014-03-10

作者简介:王佃利(1971—),男,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公共政策与城市治理研究。

政全书》、董修甲所著教材《市政学纲要》等均深受推崇。民国市政学者针对国内“向无市政之可言”“对于市政之教育,既不注意”“市政书籍,又乏善本”,从事市政的官员“大都皆乏市政学识与经验,对于欧美办理市政之良法,既多隔阂”的现状^[4]序,在全国普及市政学研究,传播国外城市市政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国内市政建设提供理论引导,培养市政人才。市政学者欲通过努力,“使中学及中学下各学校之增加市政学科者,能得相当之市政教本;使普通市民,欲悉各国求得自治权之方法者,能得适宜之参考书籍;使各省办理市政之当局,欲知欧美各国及中国各市市政办理方法者,可得一定之门径”^[4]序。这一时期的中国市政学研究范式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学科定位于政治学的下属学科,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视角研究市政学。董修甲认为,市政学是研究关于城市市政府及市行政之学术,政治学是研究国家政制与国家任务之科学,城市为一国最重要最小之区域,其政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之下级自治团体,市政学乃讨论城市与城市政府之科学,其范围与政治学相比较,为政治学一部分^[5]7。这种从政治学视角研究市政学的模式,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相关的。自鸦片战争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主题的政治救国方案成为先进人士思索的首要问题,民国学者审视和比较同样建立民主政体的中国和欧美国之间的现实政治发展差异,发现欧美国稳定的民主政治植根于其成熟的城市体系之上。因此,在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焦虑和期盼之中,学者们将城市的发展进步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联系,将城市问题引申到政治社会制度的层面^[6]。

第二,研究内容关注市政体制的制度设计。欧美国家的市政学研究包括城市政治、城市社会事务两部分内容,而民国学者更重视城市政治方面的研究,涉及城市政府及城市行政、市政规划方面的书籍共138部,而侧重城市社会事务办理的“市政工程”方面的书籍只有9部(见文后表)^[7]。研究内容服务于研究目的:美国学者研究城市政治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城市公共事物来弥补传统的弱市长制所导致的城市政府效率低下的弊端,并以此回应国家城市社会问题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中国的近代城市尚处于初步生长阶段,美国城市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在中国的城市中尚未萌芽,学者们呼吁深化市政研究主要是期望通过引入欧美的市政制度来发展中国的城市自治,进而推动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

第三,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比较政治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特征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比较市政学的专著流行,如学者刘乃成编写的《比较市政学》一书,分别介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市制的发展沿革;其二,在教材中运用比较政治的分析思路,如《市政学纲要》在分析城市地位、城市与国家关系、各国市制沿革、市选民、市选举、市政党等问题时,都采用比较政治的方式对各国现行制度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其三,出版大量的市政学论文集,按照不同的主题汇总了国内学者的论文著作和国外论文的译著。

比较政治方法的普遍应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之前,国内学术界对市政学的研究本身近乎空白,民国学者普遍具有的海外留学背景使得其对于外国市政的认识更加深刻。其二,美国市政改革的示范作用使“新型市政体制为美国的城市管理和民主政治提供了体制上的可靠保证。在传统市政体制下堆积起来的众多城市问题开始在廉洁、高效、负责的新型市政体制的努力下得到解决”^[8]。这使得当时的学者相信,中国的城市应当通过仿照欧美国家的市政体制来实现良好的城市自治。

第四,研究目的在于试图探索实现城市自治的制度设计,以城市自治实现国家的民主政治。这一时期的市政学者认为城市是将来国家生活的中心,要实现国家的善政必须着眼于城市,国家的善政在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于城市即体现为城市自治,城市自治的关键在于制度架构。开始时有晚清学者认识到“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于其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后来,又有民国专门市政学者研究“欧美办理市政之良法”。民国时期的市政学者就在“体制建设——城市自治——民主政治——国家发达”的路径选择中不断深入市政学的研究。

由于受制于中国市政的发展现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除了翻译欧美先进国家市政学名著之外,国内学者推出的著述普遍水平不高,具备相当学术水准的更属少见,不乏对西方或日本市政学理论抄袭或汇编的著作。”^[9]但最重要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在中国近代城市的起步阶段,准确、敏锐地预见到城市未来之于中国的巨大作用和重要地位,将市政学这门学科从欧美国引入中国,并建立起体现时代特征的市政学研究范式,使之成为中国市政

学研究的发端,这为中国市政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

二、现代市政学研究范式:市政学的重建

市政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一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刚刚起步就因战乱和社会动荡而陷于停滞。新中国成立后也发展曲折,在1952年被认作“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撤除,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老一辈学者如夏书章、王邦佐等人的极力呼吁和推动下,市政学学科才得到恢复发展。特别是1985年以后,许多政治学学者开始从事市政学研究,市政学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时期。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学者们普遍重视探索适合于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和政治体制的市政学研究新范式:若谓市政学过去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其实颇多技术性内容),为何不能有无产阶级真科学”;过去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为何不能有“社会主义这一套”^[1]自序。因此,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市政学,已经成为各方面殷切期待的紧迫任务^[2];组织多学科力量共同攻关,逐步建设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政学,为中国的市政管理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为城市体制改革提供参考方案,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3]。与此同时,国内高校陆续恢复行政管理学研究并设置了行政管理学专业,市政学成为行政管理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拓展了市政学的研究。

三十年间,市政学研究不断深化自身独特的研究框架,学者们将这一时期的市政学研究称为“现代市政学”以区别于民国时期的“传统市政学”研究,甚至也有学者为了体现这一时期市政学研究重视“管理”的特征,将这一时期的市政学研究称为“城市管理学”。现代市政学研究过程中以城市发展的重要公共事务为重点,探索解决中国目前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时期的市政学研究范式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学科定位于行政管理学的下属学科,从行政管理的视角研究市政或城市管理问题。现代市政学的创始人之一夏书章讨论市政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关系时就指出:“我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是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管理)学和市政(市行政、城市管理、市政管理)学。这两门学科的关系密切,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应用。”^[4]

现代市政学研究根据市政主体的不同分为广义的市政和狭义的市政。狭义的市政将城市政府

作为城市管理主体,譬如夏书章认为中国的市政学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体制下,城市政府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带全局性事项或重要事项所进行的行政管理^[5]¹⁵;张永桃认为中国的市政学是研究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特别是城市的国家行政机关,对城市各种公共事业和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并揭示其规律的科学^[6]。近年来成为主流话语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理论也影响到主张多元主体参与的广义市政概念,研究城市公共权力机关为了促进城市发展,解决城市各种公共问题、有效管理城市公共事务、实现城市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以及城市公民、利益群体等对公共政策的各种影响活动^[7]⁴。

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导致现代市政学和城市管理学从根本上明显区别于民国时期传统的市政学研究,也使现代市政学和城市管理学之间难以做到真正的分离。在学者杨宏山看来,市政是城市行政机关为维护辖区内的公共秩序和满足市民需要而对行政事务和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各项活动及其过程^[8]²;而城市管理则是多元主体对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9]²。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对城市公共事务的研究不断细化,城市管理将成为现代市政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研究内容以城市公共事务为主。夏书章认为市政学的研究既包括市政府,也包括市政府统筹、主持、指导之下进行和办理的业务,包括社会主义的公共关系^[10]²⁹⁻³⁰。关于城市管理,他更是强调“在社会主义的城市管理中,对人的管理,做人的工作,是为了使城市社会集体协调运转,获取更大的综合效益,为城市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也就是说,管人只是手段,治事才是目的”^[11]¹⁴。夏书章有意地将市政学与城市管理学区分开,认为城市管理学更多的是研究如何对城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而市政学则还包括对市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运转等方面的研究。但在其看来,无论是市政学还是城市管理学,都包含对城市公共事务的研究。民国时期的传统市政学,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公共事务,笔墨是偏少的。王邦佐在比较两个时期市政学研究时也认为,早期的市政管理大多集中于组织性的管理方面,如城市政治和行政机构的设置、市民权利的行使等;现代市政管理则注重于城市管理的诸多方面,如城市规划及其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卫生与环境、社会安全与福利、市民闲暇时间

的安排等^[4]。

后来的学者在学习、吸收夏书章等人思想的基础上,越来越强调市政学的管理性特点。现代市政学主要研究市政管理主体、市政管理客体以及市政管理规律。从这一框架出发对传统市政学进行解构就会发现,传统市政学以政府为单一主体,遵循传统的政府管制型管理来研究城市市政体制的架构、政府组织模式乃至公共权力的分配,鲜有涉及中国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及实现城市自治的“组织架构”“法律章程”“议决制度”为市政“规律”;现代市政学则重视多元主体参与市政管理,研究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视能够实现科学决策、合理制定公共政策、高效处理城市公共事务、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方法”“经验”“原则”为市政“规律”。这些区别源于市政学研究的社会环境差异。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上有国家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下有依法赋权履职的城市政府,城市政府的体制架构已经不是尤为紧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与快速城镇化相伴而生的城市公共事务和城市社会问题,则成为了当前市政学研究之急务。正如夏书章所言:“现代化与城市化相联系,城市现代化又带动全国现代化。因之,现代化的城市管理应作为重点、热点来研究。”^[5]

第三,研究方法上普遍采用跨学科综合研究。其一是跨学科研究。夏书章引入管理学的基本概念,认为从事市政行业的同志都必须了解带有共同性的问题: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协调、检查、预算,对于中国实际还要尤为关注目的、改革、信息、研究、立法等问题^[6]。随着21世纪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理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有限政府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城市治理理论、绩效管理理论、公共参与理论、无缝隙政府理论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构建起市政学的理论模型^{[2] 31-51}。其二是综合应用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夏书章提出在城市管理研究中可以直接应用调查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等进行研究,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归纳出自己的方法体系^{[6] 18}。随着市政研究的不断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不断加强,现代市政学也多采用系统的方法、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以及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市政学研究^{[1] 13}。

第四,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市政管理来解决城市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最终

实现善治。现代市政学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即“城市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城市政府”^{[7] 4};“城市政府垄断指挥、管制和监督权,凡事都由城市政府负责和拍板”^{[3] 6};“城市政府作为唯一的公共权力承担者,负责城市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1] 17},并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现代市政学认为“随着城市第三部门和市民社会的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团组织、社区组织等都将成为积极的城市管理者”^{[7] 5};“现代城市管理注重利益相关者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注重在政府与社会以及私人机构之间达成合作与伙伴关系,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城市善治”^{[3] 6};“现代市政管理更多地体现了治理的理念,城市治理强调市政管理中城市利益相关者对城市发展的广泛参与,注重政府与企业、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伙伴关系”^{[1] 11}。

现代市政学对多元主体的关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源于行政管理理论的演变。由市场失灵引发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社会事务,取代了传统的“守夜人政府”;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政府失灵所引发的经济“滞胀”又使得社会第三部门兴起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而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角色之一,以民营化理论、公共治理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理论对市政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基于国内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传统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已经越来越明显,改革进入“深水区”,合理划分政府权责、科学界定政府角色职能成为主流议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由此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从国家到地方,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分离出来的职能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三、城市政治学研究范式:政治学视角的整体“回归”

中国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有其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的市政学研究者主要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市政制度,20世纪80年代市政学在国内学界恢复后,最早便是由一批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开展市政学的研究。王邦佐将市政学看作政治学

的一个分支,主要以城市政治、行政以及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4];陈晓原认为市政学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应当将城市政权作为其研究对象^[8]。

进入21世纪以来,同样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问题,一批学者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经验另辟蹊径,重新回归政治学的学科视角来看待中国发展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分析城市中存在的矛盾冲突。这种与“凸显管理”特色的行政管理学视角下的现代市政学截然不同的城市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城市政治学。相比于传统市政学以及早期政治学学者所研究的现代市政学,城市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有了明显创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学科定位上对政治学视角有新的理解与把握。研究城市政治学的学者认为,从政治学视角研究城市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其一,中国的高速城市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城市”这一新的空间;其二,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城市内部冲突证明政治在深刻地影响城市化进程,作为一种协调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活动,政治在处理城市内部冲突中也将起到重要作用;其三,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政治性呼应了古希腊政治学先贤将“城市”与“政治”同义的理解^[9]。学者曹海军认为城市政治学可以被视为在特定地理空间上发生的关于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活动^[20]。

第二,研究内容上关注对城市政治权力的工具型研究。“权力”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和基本问题,是传统市政学和城市政治学回避不开的研究对象。传统市政学对权力的研究则是一种体制型研究,介绍国外的市政体制和政府组织的经验,试图寻找能够有效实现权力制衡的市政体制架构,通过法律制定和制度设计使市民拥有参与城市政治的权力,实现市民自治。城市政治学对权力的研究是一种工具型研究,学者们的研究不再限于体制的架构,而是透过对城市政治生活的本质、制度运作、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形成解决城市政治问题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设计出有效的政治解决方式,实现优良的城市政治生活^[20]。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许崇德编著的《城市政治学》就将“市政权的组织和建设”作为城市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21]。学者何艳玲则提出了城市研究的三个经典问题,即指出了权力、治理和市民是城市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谁使用了城市权力,城市治理的性质,市民如何影响这些权力和治理以及如何被这些权力和治理所影

响”^[22]。姚尚建认为城市政治学从宏观层次研究城市形成中的权力变迁;从中观层次研究城市演变中的结构调整;从微观层次研究空间优化中的权力平衡。

第三,研究方法上基于“治理理论”研究城市政治现象。民国时期的传统市政学用比较政治的方法研究市政体制,侧重于对各国城市政治体制的介绍;当今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视角转向治理理论的视角,介绍国外城市政治学的前沿理论,分析中国城市治理的主要任务,探索中国城市治理途径,研究城市治理涉及的若干主题,包括城市治理理念、城市政府、城市规划、城市竞争、社区治理、基层政权建设等主要内容。研究城市政治学的学者倾向于“宏观把握、微观着手”,即以城市权力结构为分析主题,以社区为直接分析对象。一方面,中国城市社会转型使得社区的力量日益壮大,逐渐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城市政治学大量采用实证研究,要考虑观察的可能性和分析的有效性,选择的观察对象在外延、范围上宜小不宜大,社区无疑是最佳选择^[9]。

第四,研究理念上强调“城市治理”的观念。城市政治学认为城市是国家生活的中心,政治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城市政治学的主流话语体系,城市治理于是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城市政治学应当从权力结构、治理过程、城市居民对权力结构和治理过程的反作用力这三个城市治理乃至城市政治学的经典主题出发,探索中国当前城市治理目标、城市政府组织、城市规划、竞争以及基层治理的发展和转变,从而实现城市善治,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健康的城市化发展路径。

当前,国内从事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城市研究经典和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另辟蹊径,从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市政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国目前高速城市化中存在的城市问题进行了分析,其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面对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在中国进一步开展和深化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从社会发展的立场来审视城市的政治使命,既实现了研究视角的根本性转换、也为中国城市政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由于城市政治学的研究在中国开展的时间尚短,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实现城市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以及学科建设的本土化。

结 论

传统市政学研究者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刚刚

起步的阶段就敏锐地判断出未来城市在国家中的中心地位,预见到城市建设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与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使得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到城市,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对此作出回应。贯穿市政学研究演变的核心是对城市善治的追求:传统市政学将“善治”解释为制度化、秩序化的民主政治,试图在城市建立起适宜自治的市政体制和民主机制以实现城市自治,以城市自治带动国家民主政治;现代市政学将“善治”解释为城市中市政主体科学、高效处理城市各项事务的能力,试图通过合理的权责划分使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各司其职、各擅所长,共同参与城市事务的治理;城市政治学将“善治”解释为“更少的损耗,更美的服务”,关注于城市的权力结构、治理过程、城市市民对城市权力结构和治理过程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各项城市治理主题。随着现代市政学研究向更加细化、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从管理学视角研究城市生活重要事项的城市管理学和从政治学视角研究城市权力、治理和市民的城市政治学,将成为未来市政学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和路径。

参考文献:

[1] 赵可. 留学生与 1920—1930 年代市政学的传入及其人才培养 [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2] 董修甲. 市政学纲要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3] 赵可. 晚清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萌动与走向 [J]. 中州学刊,1999,(1).

[4] 赵可. 20 年代我国留美知识分子对市政体制改革的探索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5] 夏书章. 市政学引论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6] 李方.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市政学 [J]. 政治学研究,1985,(2).

[7] 魏晓欣. 第一讲:城市行政管理与市政学 [J]. 政治学研究,1986,(2).

[8] 夏书章. 小政府大社会之路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序.

[9] 夏书章,严家明. 中国城市管理 [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10] 张永桃. 市政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

[11] 王佃利,张莉萍,高原. 现代市政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 杨宏山. 市政管理学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6.

[13] 杨宏山. 城市管理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4] 王邦佐. 拓展市政学的研究 [J]. 天津社会科学,1997,(4).

[15] 夏书章. 中国政治学、行政学、市政学研究世纪末展望 [J]. 政治与法律,1994,(5).

[16] 夏书章. 市政管理八议 [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10—11.

[17] 马彦林,孙春霞,刘建平. 现代城市管理学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8] 陈晓原. 也谈市政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体系 [J]. 政治学研究,1988,(6).

[19] 郑芸. 城市政治学十年回望:进入路径和研究范式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0] 曹海军. 城市政治学:研究对象、性质、特点及发展趋势 [J]. 思想战线,2013,(6).

[21] 许崇德. 城市政治学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8.

[22] 戴维斯,英布罗肖. 城市政治学理论前沿 [M]. 何艳玲,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总序.

市政学译著分类表				单位:部
出版年份	城市政府及城市行政	城市规划	市政工程	总 计
1920—1928	40	18	1	59
1929—1937	30	27	5	62
1938—1949	3	7	2	12
出版时间不详	11	2	1	14
小 计	84	54	9	147

责任编辑:朱 磊,巩村磊